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79年2月20日 星期二
农历己未年正月廿四 第11183号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迅速发展煤炭生产

煤炭部号召煤炭战线广大职工为加快四化步伐作出更大努力，为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煤炭工业部今天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全国煤炭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发扬“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迅速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持续的增产节约运动，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前进步伐作出更大努力，为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作出积极贡献。

今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煤炭工业的形势是好的。全国统配煤矿一月份原煤、洗精煤生产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二月上半月由于春节和其他原因，产量一度下降，最近已开始回升。即将展开的这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必定将进一步促进煤炭生产的发展。

煤炭部电话会议指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多快好省地完成生产建设任务，是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重要标志。只有搞好增产节约，迅速发展生产，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开展增产节约，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目前，我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越南侵略者。我们更要利用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多出煤，出好煤，支援我光荣的边防部队和边境同胞，给越南侵略者以有力的还击。

电话会议要求各企业党委放手发动群众，层层制定增产节约计划。各省市、矿务局要尽快把本地区、本单位的增产指标落实到每个区队、班组，同时要根据原煤增产计划安排好掘进计划，保持采掘协调。在制定增产计划的同时，还要本着

多快好省的要求，制定保证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降低造价、节约原材料、减少事故的指标和要求。要以技术管理为重点，从加强管理，打好基础抓起，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搞好定员、定额、定岗位的“三定”工作；建立和健全责任制；加强经济核算，搞好清产核资；要组织采掘工作面的正规循环作业。

电话会议指出，我国煤矿职工一向具有顾大局、识大体、维护革命团结的胸怀，一向具有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千方百计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的革命精神。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只要我们继续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坚持学大庆，赶开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同心同德，团结战斗，就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美国国家组织秘书长菲尔菲拉时，同他就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邓副总理在谈话时表示，中国希望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

邓副总理会见奥尔菲拉秘书长

表示中国希望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

新华社北京二月十九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美国国家组织秘书长菲尔菲拉时，同他就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邓副总理在谈话中表示，中国希望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奥尔菲拉秘书长在会见了邓副总理后，表示将把邓副总理的谈话内容转告美国政府。邓副总理还向奥尔菲拉秘书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他的友好问候。

奥尔菲拉秘书长是在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的。在日期间，文化部副部长王澍生分别会见了奥尔菲拉秘书长。

奥尔菲拉秘书长是在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的。在日期间，文化部副部长王澍生分别会见了奥尔菲拉秘书长。

奥尔菲拉秘书长是在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的。在日期间，文化部副部长王澍生分别会见了奥尔菲拉秘书长。

用实际行动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

广西云南人民努力增加生产

新华社南宁二月十九日电 广西各族双桥人民公社的干部、社员，对越南背信弃义侵犯我边疆，破坏边疆生产，非常气愤。最近几天，全公社出动五万多名社员、三百多台拖拉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高潮。

广西农业机械化先进单位武鸣县双桥人民公社的干部、社员，对越南背信弃义侵犯我边疆，破坏边疆生产，非常气愤。最近几天，全公社出动五万多名社员、三百多台拖拉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高潮。

广西农业机械化先进单位武鸣县双桥人民公社的干部、社员，对越南背信弃义侵犯我边疆，破坏边疆生产，非常气愤。最近几天，全公社出动五万多名社员、三百多台拖拉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高潮。

广西农业机械化先进单位武鸣县双桥人民公社的干部、社员，对越南背信弃义侵犯我边疆，破坏边疆生产，非常气愤。最近几天，全公社出动五万多名社员、三百多台拖拉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高潮。

七日前下午二点钟到半夜十二点钟就包装完五十万斤。接着，他们又经过两天奋战，超额完成了其余五十万斤大米的加工任务。

从湛江港口到友邻关下，八百里运粮线上一片繁忙景象。一列列满载着煤炭、石油、钢材、矿石、水泥、化肥、农药、拖拉机等各种物资的列车，源源运往城乡各地。

据新华社昆明二月十九日电 云南省工农业战线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决心同广大群众一道加倍努力增加生产，用实际行动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保卫我国边疆和平安宁。

五届人大代表、昆明铁路局一五六三机车司机尹昌昌说：我开了二十五年的火车，拉过大量的援越物资，可是越南当局背信弃义，打我列车，杀我军民，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我边防部队的自卫还击，我们现在对机车进行了特别保养，加强了自检自修，以保证机车随时处于良好状态，做到多拉快跑，满载超轴。

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昆明电机厂工人刘其英，过去七年已完成了二十五年的工作量。现在，他正在一九九一年的话，他说，我要一天干三天的活，用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的新成绩，支援边防部队还击越南侵略者。

云南省劳动模范、云南印染厂彝族工人工程师戴仁心和工人们已订出计划，决心用二十天时间完成一个月的生产任务，把本月初十日的因检修机器而削减的任务全部补上去。

曾荣获国务院增产奖章的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昆明市农林办公室副主任李能说，过去我们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全力支持越南的救国战争。今天，越南当局背信弃义，疯狂反华，调转枪口杀我同胞，侵我边界，实在欺人太甚！我边防部队奋起还击侵略者，表达了我們全市人民的心愿。我决心和广大群众一道，加紧生产多打粮食，支援边防部队。几天来，六十多岁的李能不顾体弱多病，深入到郊区别国营农场和农村社队，组织广大职工、农民抗旱备耕，夺取今年粮食丰收。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奥尔菲拉秘书长

实现轻工产品质量升级品种更新

今明两年要增加三百种以上新产品，搞出一批优质和名牌产品，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据新华社上海二月十六日电 搞好轻工业产品的质量升级和花色品种更新，是轻工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轻工业部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重要标志。最近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着重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制订了相应的措施。

多年以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由于工作中没有认真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国轻工业生产技术落后，多数轻工业产品还处在四、五十年代的水平。许多产品的款式陈旧，品种单调，装潢简陋。民用缝纫机、自行车、照相机、手表等，与国外同类先进产品比较，差距较大，有的落后了好几十年。保温瓶等用品从三十年代在我国市场问世以后，式样很少变化。广大消费者称之为“几十年一贯制”。有些出口轻工业产品，由于装潢不好，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竟销能力。有些大路货，如上海出产的素色脸盆、玻璃机压杯、五磅印铁五金壳保温瓶等，去年在国内市场滞销，形成大量积压。

各地轻工业部门的负责人深深感到，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轻工业产品的这种落后状态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当前，抓好轻工业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新产品试制，不仅关系到轻工业本身的现代化，而且是关系到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出口，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资金的大问题。因此，他们决心从一九七九年起，一定要扭转重产值、产量，轻质量、品种的倾向，克服“管它老不老，反正有人要”的错误思想，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作为中心任务抓紧抓好，切实抓出成效来。许多地方的实践证明，只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是完全可以改变轻工业产品的落后面貌的。去年，江苏省轻工业局和上海手工业局为发展新产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创作设计活动。他们吸收到大专院校、科研部门的科技人员和老艺人同企业的科技人员一道进行新产品设计，对设计、试制新产品成绩显著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去年以来，江苏省轻工业局试制成功了折叠式家具、家用电冰箱、特种建筑纸、自动调光眼镜等六十七种具有先进水平的新产品。上海手工业局去年用短短三个月时间就设计、试制成功了二千三百多种新产品、新品种、新花色。根据这些行之有效的经验，轻工业部提出，今明两年内，全国要增加三百种以上轻工新产品，其中相当一部分要经过试制成功和已经投产的第三代石英电子表、高频自动双日手表、内变速自行车、轻合金电动多能缝纫机和自动洗衣机等。食糖、原盐、纸、卷烟、合成洗涤剂、乳制品、罐头、酒、皮鞋、家具、工艺美术品等，也要搞出一批优质产品和名牌产品。

实现轻工业产品升级换代，一定要积极开展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活动。一方面充分发动群众，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同时也要有步骤、有选择地从国外引进生产线、单机和技术专利。上海牙膏厂利用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个厂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先后从国外引进九台先进设备，并相应地制造大批配套设备，建成了十条软管自动化生产线和九台牙膏包装机，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为了在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的同志中指出，实现产品升级换代要一抓到底，今年轻工业系统的技术措施费主要应当用于重点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新产品试制。对设计成功的新产品要及时组织试制，对经过鉴定合格的新产品要及时组织批量生产，及时投放市场，不能只搞“样品”、“展品”、“礼品”，要改变“橱窗里看得见，柜台上买不到”的状况。大家还指出，为了确保轻工业产品升级换代取得成果，必须实行优质优价、按质论价。各有关部门在原料、材料、设备上给予保证和支持，要供、产、销密切协作。上海轻工业部门已决定建立新产品试销门市部，使生产部门直接同消费者见面，根据消费者的意见，不断改进产品质量。轻工业部决定于今年九月在北京举办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要求各地轻工业部门认真组织技术协作交流，开展友谊竞赛，争取生产更多新产品，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参加全国轻工业局长会议的同志指出，实现产品升级换代要一抓到底，今年轻工业系统的技术措施费主要应当用于重点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新产品试制。对设计成功的新产品要及时组织试制，对经过鉴定合格的新产品要及时组织批量生产，及时投放市场，不能只搞“样品”、“展品”、“礼品”，要改变“橱窗里看得见，柜台上买不到”的状况。大家还指出，为了确保轻工业产品升级换代取得成果，必须实行优质优价、按质论价。各有关部门在原料、材料、设备上给予保证和支持，要供、产、销密切协作。上海轻工业部门已决定建立新产品试销门市部，使生产部门直接同消费者见面，根据消费者的意见，不断改进产品质量。轻工业部决定于今年九月在北京举办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要求各地轻工业部门认真组织技术协作交流，开展友谊竞赛，争取生产更多新产品，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轻工业是关系人民吃、穿、用的部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购买力将有很大的提高。轻工业要拿出质量好、花色品种对路、数量更多的产品来，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由国外引进新技术，国家需要大量的外汇和建设资金。轻工业投资少、收效快、积累多，扩大出口的门路广，用汇少，换汇多，在这方面必须作出更大的贡献。农业、重工业、国防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也要求轻工业提供更多的优质配套产品。这都说明，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十分迫切，十分重要。

为了使轻工业发展得快，轻工业部门响应三中全会的号召，坚决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上海轻工业行业多，企业多，生产周期短，转得快比其他部门转得快，转得好，早转出成效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目前轻工业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产品质量不好，数量不足，花色品种少，不少产品是多年“一贯制”，很少更新，生产设备落后，经济技术管理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低。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国内市场需要难以满足，将会影响人民的需求，影响建设资金的积累；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缺乏竞争能力，不能扩大出口，甚至会被挤出去的可能。我们应当正视这种现状，加快轻工业现代化的步伐。

轻工业部门转移工作的着重点，应当结合自己的特点，先从几个方面做好工作。轻工业产品涉及千家万户，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搞好产品质量十分重要。过去一个时期，由于产品少，供不应求，掩盖了产品质量低的问题。现在，轻工业部门必须从过去着



轻工业要有较快的发展

重抓产量、产值转到着重抓质量、品种上来，在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的品种上狠下功夫。各个企业之间，要有互相比赛、竞争的精神，在企业之间，实行质量好坏一个样，品种新旧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消耗多少一个样的作法，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在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企业之间应该允许互相竞争，没有竞争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在竞争过程中，淘汰极少数产品低劣、群众不满意、搞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企业，有什么不好呢？这是鼓励先进，反对落后。我们不能让极少数经营亏损的企业，长期躺在国家身上，吃社会主义大锅饭。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有计划地从国外引进新技术，这是实现轻工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轻工业引进新技术，花费外汇少，投资见效快，偿付能力强，外汇收入多，应该大胆地办。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水平，改善经营管理，而且可以发挥以轻养重，以快养慢的作用。当然，轻工业行业多，不可能所有行业统统引进成套设备，齐头并进，而应该通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合作办厂等多种形式，根据实际需要，引进生产线、单机或技术专利。轻工业引进新技术，一定要注意同老厂的技术改造、技术培训、科学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加以消化和发

展、提高。

我国手工业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都享有较高的声誉，不仅现在，即使将来也不可少。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进一步落实党对手工业的各项方针政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强调实现现代化，而把手工业搞掉。不要忘记，手工业产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因为它有精湛的手工艺。

要使轻工业有较快的发展，不仅轻工业部门的广大职工要作极大的努力，还要有外部条件的配合，要有各方面的支援。大家知道，轻工业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以一九七七年为例，它提供的积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它换回的外汇，占整个外贸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可是，我国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致是一比八，那时市场供应的轻工品是比较充裕的。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研究了国内外的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提高轻工业投资的比重。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轻工业的投资比重反而下降了。应当说，轻工业这条腿是短的。我们应当为此大声疾呼。我们要从总的方针上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

在物资供应上，要照顾到轻工业生产和建设的需要。现在，有些地方对轻工业口头上是“不挤不让”，

思想上是“可挤可让”，实际上是“又挤又让”。缺少了，首先挤轻工业；必要的物资有了缺口，也多是留给轻工业。轻工业消耗的燃料、电力、原材料占整个工业的消耗比重其实很少，只要重工业节约一点，就可以为轻工业解决很多问题。轻工业产品绝大部分是消费品，同商业的关系十分密切。沟通生产和流通之间的渠道，商业工作十分重要，搞好了，就能促进生产，指导消费，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搞不好，就可能把生产和消费隔离开，妨碍生产，影响消费。这就需要很好地把计划经济同市场需要结合起来，用计划经济来调节市场，用市场需要来补充计划；还要很好地把生产和消费结合起来，用生产来满足消费，用消费来促进生产。轻工业要加强按社会需要生产，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一步要增强计划性，克服盲目性。商业部门应该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树立为生产服务的观点，合理组织网点，改进商品调拨，积极扩大销售。今后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有些产品可以继续包销，有些产品可以由商业部门选购，有些产品可以由工业部门自销，新产品则由工业部门展销。产销环节不能搞得很多，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改变目前轻工业出口产销环节的最好办法，是实行工业和外贸合一。这样能，经营环节少，生产改进快，交货周期短，易于做到产销对路，可以多生产，多出口，多换汇。

当前，轻工业生产的形势很好，有利条件很多，全国人民对轻工业部门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轻工业系统的干部和职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选举能领导群众增产的人当干部

队长 这些新选的干部领导的生产队去年几乎队队增产

新华社呼和浩特二月十九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在民主选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时，采取“列图表，看路线，评班子”的办法，选举真正能领导群众增产粮食的人来当。社员们欢欣鼓舞地说：这个办法好。让这些真正能够领导我们夺取丰收的人当干部，我们信得过，干话有奔头。

杭锦旗的这种作法是从一九七七年冬整顿领导班子时开始的。在民主选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之前，首先把历年的粮食总产量、对国家贡献、社员的收入和主要干部的名字，列成图表，公布于众。然后发动社员群众根据图表，分析路线，总结工作，评论班子，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民主选举。这样选干部的结果，一批懂生产、讲政策、踏实负责的人被选上了队长。经过一年的实践，这些新选的干部领导的生产队，几乎队队增产。

长期以来，杭锦旗农村基层干部很不稳定，许多生产队长一年一换或几年一换。很多敢于说真话、讲真理、大胆负责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而那些能说会道、看风使舵的人趁机上台。还有一些所谓“老好人”，不负责任，很少做工作，但因为“不惹是生非”，对错误的东西不抵制，不斗争，反而被某些领导看中了，成了生产队的“不倒翁”干部。有的队也实行民主选举，但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是非不清，好坏不分。沙海公社选举一队的爆发，当队长多年，粮食产量年年上升。杨发对工作认真负责，谁踩死队里一亩庄稼也要问个究竟，就是因为得罪了一些人“落选”了。所以，虽然实行了民主选举，往往还是那些“不倒翁”得势。通过“列图表，看路线，评班子”，社员群众看清楚了就是应该选举杨发这样的人当队长。

沙海公社丰产大队第五生产队，在“四清”运动以前粮食亩产就上了《纲要》。“四清”运动中，生产队长王仁义因被错划为富农成份而下台。由于没有一个好队长，这个队粮食亩产平均逐年下降到二百斤左右，九个年头“吃返销粮”。一九七八年底，通过“列图表，看路线，评班子”，社员们认为还是王仁义当队长好。经审查，确定王仁义划为富农成份属于错案，应予纠正。于是，王仁义又重新当了队长。一九七八年，五队的粮食总产量和社员平均收入分别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六十四。两年多以来，杭锦旗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班子，都用这种方法进行了整顿和民主选举。能增产粮食的队长一个接一个地当选，改变了农村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一九七八年，全旗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七年增长二成半以上，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据新华社昆明电 新华社记者张炳森报道：云南省摩托车厂工人董志新，在最近民主选举车间主任时，毛遂自荐，参加竞选，获得群众信任，当选为工模车间主任。

这次选举是在去年十二月下旬进行的。当时，厂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制定了民主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办法。办法规定：为了充分保障工人行使民主权利，从产生候选人到正式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职工可以自荐为候选人。任期二年。根据这个规定，董志新报名参加了车间主任的竞选。

董志新今年三十六岁，已有十八年工龄，先后干过铸造、机械、设备管理工作。他学习勤奋，技术熟练，工作能力较强，群众关系较好。粉碎“四人帮”以后，他除了积极完成本职工作外，经常研究改进车间管理工作的方法，有自己的一些设想。

工模车间群众进行无记

目前，许多企业、事业单位的政治学习，仍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毛病，其表现：

学习次数多。有的单位规定，每周业余学习两三次，加上党团员过组织生活，每周学习和开会时间过多，搞得职工疲惫不堪。

学习时间长。不少单位一学就是一小时以上。有的机关、学校、工厂的行政部门，每周还要搞两个小时半天关学习。

学习无的放矢。所学内容不结合本单位实际，解决什么问题不明确，学习时东拉西扯，由南向北，漫无边际。有的单位把学习会变成读报会，自始至终，一人朗读，众人闭目养神，学习效果极差。

诸如此类政治学习，既浪费了大量时间，又不解决实际问题，成了职工的一大负担，大伙厌烦透了，要求端正学风。可是，一些单位的领导仍在那里左右右盼，不愿改革，有的单位甚至将参加学习与否、发言次数多少，作为评奖的条件，职工只好硬着头皮参加。

这些单位在学习上至今还有这种形式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领导同志的思想仍未解放，老是担心政治学习上不了，怕戴上政治挂帅的帽子。因此，明知问题不少，也不去解决。我们要政治学习的。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学习，说到底，是林彪、“四人帮”搞的所谓“突出政治”、“天天读”、“雷打不动”余毒的反映。目前，我们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生产建设上来，政治学习也要适应这个变化，引导大家提高对四个现代化的认识，学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本领，干好四个现代化的工作。安排学习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少而精，有的放矢，不要过多占用职工业余时间。学习和办其他事情一样，要讲求实效。

在对外经济技术交往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

辽宁的一些同志提出：大胆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为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不要怕蒙受“资本主义经营”之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要在人员、物资等方面作好充分准备，切忌仓促上阵；出国学习和考察技术，要注意人选，要选派有真才实学的内行

同国外经济技术交往日益频繁，实践中出现了些应注意的问题。记者在辽宁采访，听到许多有关的宝贵建议，值得大家思考。

大胆学习 为我所用

在一个座谈会上，同鞍钢的副总工程师杨树棠相见。这位年过七旬的专家，早年在美国读书，回国三十多年来，对鞍钢的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熟悉鞍钢的每座高炉，每个平炉，每台轧机。杨树棠同志说，今日鞍钢的生产形势，恨不得让高炉插上翅膀向前飞跃。谈到实现四化问题，杨树棠同志说，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对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要学习，对国外行之有效，对生产有利的经营管理经验也应借鉴。日本的资本家有句办工厂的“经”：时间就是钱。人多就是灾，用户就是王，安全卫生就是法。节约、劳动生产率、质量、文明生产都包括进去了。为什么他们用人那么少，钢铁生产水平那么高？科学管理是个重要的因素。国外是十分钟出一炉钢，几秒钟轧多少材，而我们的老套是一天炼几炉钢，一个班次多少材，生产管理人员脑子里缺乏分和秒的概念。这是不利于加快建设速度的。前些年，鞍钢动不动就开十几万人的广播大会，实在浪费。若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最蠢的资本家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否则，别说赚钱了，他有几个大人也得赔进去。

据记者所知，对于学习国外科学的企业管理经验，有的同志还不够重视，甚至还有疑虑，主要是担心会改变企业的方向，怕蒙受“资本主义经营”之嫌。其实管理方式、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同科学技术一样，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我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管理，为我所用，其结果是

加速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引进先进技术和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对发展生产来说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管理和技术是发展生产的两个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毛主席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地号召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部分。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去研究和学习外国的管理经验，用无产阶级立场去芜存菁，结合我们的实际加以运用。让技术和管理这两个轮子同时转动，推动我们的经济建设更快地向前发展！

准备得更充分些

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我们几十年人民战争的重要经验总结，也是几十年经济建设的一项成功经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切忌仓促上阵。否则，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沈阳有个机械厂在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

这个厂从西欧一个国家引进几十台新设备，当初没有考虑运输问题。设备经海路运到国港口，火车不能装，又改用汽车，三叉戟飞机装不下又换波音机，民用机场不能降，临时联系军用机场，一番折腾，才将设备运进厂。由于技术准备不充分，第一台机器安装好，首次开车就出了故障。正因为各方面准备工作不扎实，几年了，设备只安装了一半。安装这批设备需要二百多名懂外语的技术人员，至今仅选设备三十名，只此一桩就误事不小。掌握这样的设备需要五级以上水平工人，至今还没有配齐。原计划今年三月开始生产，因人员、技术、管理跟不上来，只好延期。

从这个厂的经历可以看出，搞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万万不能粗心大意。人员、物资、资

料，乃至运输、装卸等各个方面，都得作好准备工作。既要有关切切实的组织保证，又要有严密的技术措施，计划要周全，安排要实在，这样，才免得闹出“楼上轿现扎耳朵眼”那样的笑话，才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鞍钢的新区建设，已着手作准备工作。他们决心锲而不舍，不请客上门。

探宝还需识宝人

目前，出国进行技术考察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人选上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说：“出国人员要能真正学东西回来，就得精心选择，要选派有真才实学的人，或有丰富经验的老师傅。俗话说：懂行的看门道，不懂行的看热闹。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再加上肯钻研，才能满载而归。现在，这方面漏洞还颇多。”

西欧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同时接待两个国家的航空工业技术考察组，对我国的考察组特别热情，让我们看得多，看得全。但由于我们派去的同志技术水平不高，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固然开了一些眼界，学到的本领不多。轻工业部的同志对记者说，最近沈阳正在组织的一个出国技术考察组，除了局行政干部和翻译外，懂行的人没几个。这样的考察组能有多大收获？联想到北京红星养鸡场的曾先后派出数名职工去两个国家学习考察，时间不下数月，但回国后大部分转业改行，这笔学费花费实在冤枉。

现在，有的工业部门通过考试挑选出国学习考察的人员，这个办法效果较好。沈阳机床厂总工程师罗时大说：去年我们厂分得五名出国考察的指标，有九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出国，全部落榜，只好改由别的工厂选派。这一来，坏事变成好事，激起了大家勤奋学习的劲头，同志们猛攻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外语，学习气氛非常浓。

本报记者 齐志文

为“四化”争挑重担

云南省摩托车厂工人董志新报名参加车间主任的竞选,结果获得群众信任而当选

问：你是个普通工人，有什么办法当好车间主任？

答：这要靠实践来回答。现在，全党全国都在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是我们车间的管理制度很落后，不适应这种转移。我决心在厂党委领导下，搞好车间管理，合理安排劳动力，搞好工人的技术学习。在工作中，我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依靠大家把车间建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坚强集体，把生产搞上去。

问：搞不上去怎么办？

答：过一段时间，如果你们认为我能力不行，车间职工代表大会可以随时罢免我的职务，安排有能力的人来

实事求是 讲求实效

首钢炼钢厂扎扎实实抓生产，放弃靠拼体力、拼设备争夺单炉炉龄全国冠军的作法

采访札记

去年十二月，首钢炼钢厂二号转炉的职工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创造单炉炉龄五千千炉的新纪录，夺取全国炼钢转炉炉龄的第一名。但是，最近他们决定这次不争这个第一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特地到首钢炼钢厂了解。

这个厂的副厂长、工程师陆祖康告诉我，他们放弃争单炉炉龄全国冠军，并不是因为生产中出了什么问题。老实说，只要厂里拿出全力来抓这件事，冠军是可能拿到手的。但是，我们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考虑，觉得这种脱离客观条件，拼命追求单炉炉龄的做法，除了只能得到一个个全国冠军的空名以外，没有任何好的效果。

陆祖康说：提高炉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耐火材料的消耗，为了多炼钢。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现在这种提高炉龄的做法却很成问题。就拿二号转炉来说，这个炉子在炼了三千炉钢以后，炉壁早已很薄了，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拆炉检修，换上新的炉衬再炼，重新计算炉龄。这样做比较经济合理。但是，为了追求单炉炉龄，却强行继续冶炼，结果炼不了几炉钢，就要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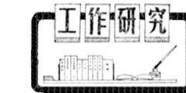
行大面积补炉，既耗费大量的耐火材料，又使很多宝贵的炼钢时间给补炉占用去了。在正常情况下，一座转炉每班可炼钢十六炉到二十炉，而由于要争炉龄第一，二号炉现在只能炼二十炉，甚至更少，效率降低百分之三、四十。陆祖康说，象这样争单炉炉龄第一，既不能提高产量、质量，又很不经济，对设备维护也不利，甚至还要影响全厂的炼铁、轧钢生产，如此得不偿失，我们为什么非要硬着头皮去干呢？

首钢主生产科的副经理徐永启说，早就不该这样干了。我们办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实际效果。转炉炉龄是要努力提高的，但要反对搞形式主义，加强管理，积极采用新技术上下功夫，使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光拼体力，更不能拼设备。这种只图虚名，不讲经济效果的做法应该纠正。

首钢炼钢厂争夺单炉炉龄五千炉的消耗虽然不能写了，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厂决定不干那种“图虚名、得实祸”的蠢事更值得宣扬。它告诉人们，千万不能热中于去搞那些空头高指标和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东西，凡事都应当实事求是，讲究实效。

新华社记者 徐人仲
(本报有删节)

上海郊区应当办成副食品生产基地



的这一生产方针问题访问了一些商业部门、郊区县社，参加了一些会议，听到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上海郊区的生产方针必须面对城市，转到以副食品生产为主的轨道上来。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有六百万左右城市居民和数十万外来旅客，对副食品的需求量很大。长期以来，由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推行“菜农不吃商品粮”、“上海自给自给”等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使郊区副食品生产受到严重摧残，造成蔬菜供应紧张，猪、禽、蛋等主要畜产品支援。粉碎“四人帮”后，这种状况有了显著改变，特别是去年，蔬菜上市均衡，数量充沛，做到了自给有余。但猪肉的三分之一，禽、蛋的二分之一仍由外省调拨供应。偌大一个城市，主要依靠外省提供副食品，必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浪费和损失。

上海市商业部门的同志算了这样几笔账：一、加重了交通部门的压力，增加了运输费用。上海从苏、浙、皖、鲁、赣、湘、鄂等省调入的副食品数量大、品种多，而且有些还是鲜活货，运输任务十分繁重。仅冻猪肉一项，每年需调一千八百节冷藏车皮、五艘千吨以上的轮船和几十条小船往返装运，运杂费高达五百六十八万元。二、变质多，损耗大，减少了社会的财富；成本高，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以鲜猪肉为例，去年从外地调入的四千万斤鲜猪肉中，碎冻、次蛋等折合净损耗率为百分之九点三，比市郊高出百分之七点一。这相当于损失了二百六十万斤鲜肉，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三、造成人力的浪费。上海有关部门每年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各地了解货源，组织采购。禽蛋公司批发部每年有上千人专门用灯光照透视验收、搬运、包装从各地运来的鲜蛋，而市郊的鲜蛋可以直接运往市场上，不需要这手续。

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同志认为，把上海郊区建成副食品生产基地很好，国营农场和一些社已经建立了三百多个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金山县的枫泾猪、川沙县的“九斤黄”（鸡）、嘉定县的肥羊等都是闻名的食用禽畜，农民又有丰富的养殖经验。宝山、南汇、金山、川沙、崇明各县面临长江和东海，可以大力发展捕捞业；坐落在青浦县境内的淀山湖，有着九万余亩水质较好的水面，更是发展淡水鱼的天赐场所。此外，国营农场饲养牛也有规定规模，可以进一步扩大。

要把上海郊区的农业发展方向转到以生产副食品为主，必然碰到一些困难，最主要的是饲料不足。上海市有关农业部门和各县干部、群众认为，只要解放思想，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第一，国家不要再向上海郊区征购粮食。这些年来，国家每年要向郊区征购八亿斤粮食，使社队集体和社员个人没有多余的粮食发展畜禽生产。今后郊区生产的粮食，除解决种子粮、社员口粮和适当留一些储备粮以外，主要应用于饲料。第二，发展郊区传统出口农副产品，如白蒜、黄草、香菇、长毛兔、编织品、珍珠、药材等，鼓励外汇，进口饲料。近郊嘉定县的白蒜质地脆嫩香辣、壳薄瓣大、蒜瓣均匀，畅销港澳、东南亚、日本、美国，深受国外消费者欢迎。据外贸部门反映，这类商品换汇率都是比较的。大家建议，国家计划出口可以以外贸部门代办，实行外汇分成。地方农业部门有了自主权后，就可把农副产品、副食品生产搞上去了，农村经济也可以“活”起来了。

建设副食品基地不是说搞小而全，样样要求做到自给。这是不可能的。大家认为，某些农副产品必须和外省互相调剂、补充，促进城乡交流，不断地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郊区各县也应该从本地区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副食品生产，做到合理安排，各有特色。

废除政治学习上的形式主义

亚进

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了。这个重要讲话，总结了建国十二年的我国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艺术民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前，全党的工作的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在这伟大历史转折的时候，重新学习周恩来的重要讲话，来解放我们的思想，解放文艺的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兴旺，使文艺更好地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具有重大的意义。

历史的回顾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繁荣文艺和发展科学的方针。它是要运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内部矛盾，解放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这个方针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体现。

“双百”方针的提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活跃了学术界、文艺界的空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但是，这个方针在贯彻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的某些部门和单位，出现了“左”的扩大化倾向。具体表现就是混淆两类矛盾，把某些文艺或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把某些在思想内容上有一定错误的作品，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把某些在思想认识上犯有某种错误的同志当成敌人来斗争，甚至把某些基本上是正确东西也当成反动的东西来打倒。五十年代末期，“左”的倾向有了新的的发展。一方面，在“拔白旗”、“反右倾”等名目下，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粗暴的打击。同时，出现了严重的搞指指。什么文艺统统要“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呀，什么文艺创作必须实行“三结合”、由“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呀，什么必须“定人、定题、定时”呀，等等。这样，文艺界就出现了种种强迫命令的怪现象，硬性摊派写作任务，硬性摊派写作数字，硬性规定写作框框。命令主义的歪风也刮到群众文化工作中来，不管你有没有文艺专长，不管你是爱好文艺，统统要从事文艺创作和表演活动，提出什么“人人写诗”、“人人唱歌”、“人人画画”等等。这样，某些文艺工作者不但不能起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作用，反而冲击了生产，妨害了三大革命运动。

针对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不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

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民主

——学习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本报特约评论员

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周恩来同志号召：“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工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工作风；改变干部工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工作风”。

一九六二年，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中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者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这个文件批判了“左”的错误，提出了改进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正确方针。之后，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分别在广州、大连召开会议，总结历史教训，讨论繁荣创作问题。周恩来同志在广州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全面论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论述了艺术民主问题，为被作了错误处置的影片《谢晋横吹》及其作者等平反。

令人遗憾的是，这场纠正错误倾向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干扰破坏。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江青之流就插手文艺界，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当文艺界批判“左”的错误倾向的时候，江青之流首先是大刮右的妖风。她的那个“顾问”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频繁活动，指令大演《游龙戏凤》、《十八扯》、《胭脂虎》这样一些早已被新中国文艺工作者所唾弃和抵制的闹剧。当毛泽东同志发出开展阶级斗争的号召，文艺界开始刮目目混乱后，江青之流摇身一变，把制造刮目混乱的责任全部栽到文艺工作领导干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身上，反过身来对文艺界大张挞伐，刮起一股更“左”的妖风。一九六四年七月，江青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大肆造谤，说什么全国两千八百多个戏曲剧团，演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当时，连最古老的剧种昆曲都演了革命现代戏，其他剧种，就演得更多了，怎么能说它们都是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呢？当时上演的传统剧目，有许多表现的是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怎么能说它们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呢？在同一个会上，那个“顾问”也大打出手，他一跳上台就气势汹汹地说，今天我是来“骂人”的，一口气点了《北京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等影片和《谢瑶环》、《李慧娘》等剧目，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它们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与此同时，他们还抛出了种种貌似科学的极左谬论，什么“题材决定”论、写十三年是“根本任务”论等等。按照这种荒谬的理论，凡是没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题材的作品统统是敌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对文艺界的大讨伐制造口实。从诬陷小说《刘志丹》到围剿京剧《海瑞罢官》，

他们在文艺界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残酷斗争。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对于文艺界的打击围剿，还是比较零星地进行，那末在他们窃取了文化工作的领导权之后，就全盘否定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对文艺界进行更加野蛮的反革命大扫荡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来揭发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残酷性和危害性，可以说，他们把整个文艺界搞成了一个推行法西斯主义“全面专政”的黑“样板”。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一、马思聪一贯主张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左”，也反右。修正主义既可以从右的方面也可以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决不能认为文艺战线的斗争只有反右，没有反“左”的任务。那种认为“左”比右好，右永远是最大危险，“左”没有多大危害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如果只反右，不反“左”，或者对“左”的东西反得不彻底，那末它就会愈演愈烈，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二、对搞“左”的人要具体分析。一种是好人犯急躁、盲动的毛病，一种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十七年中犯“左”的错误的同志，多数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林彪、“四人帮”则不一样，他们不是一般地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而是有意颠倒敌我，专门打击好人扶持坏人，剿灭香花培植毒草；他们不是一般地犯主观主义的毛病，脱离群众，不尊重艺术规律，搞搞指挥，而是专门镇压群众，搞法西斯独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两种情况性质有区别，但必须看到，他们都是危害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

三、“左”的严重后果是毁灭了文艺界的民主。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封建家长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本来就很严重，民主的传统本来就很少。文化大革命之前，文艺界的主观主义风已经受到某种破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全面专政”，更是把文艺民主取消个精光。因此，在文艺界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当前极其迫切的任务。

严格区分两类矛盾

严格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是保证艺术民主的一个前提。如果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甚至象林彪、“四人帮”那样，动不动就把作家打成“反革命”，那就只有毁灭艺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艺术民主。

粉碎了“四人帮”，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出现对作家作品的错误打击呢？只要阶级、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就可能出现。我们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它应当勇敢地向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民主精神，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迷信和专制；它应当热忱地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歌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无情地鞭笞一切反动事物，批判一切旧传统观念和旧习惯势力。既然如此，它就必须向那些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反对以至打击。事实说明，过去有一些好作品受到不公的打击，往往是因为它们勇敢地揭露了阴暗面，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现象并未根绝。前些时候，出现了一批揭露林彪、“四人帮”的好作品，有人就给扣上了“暴露文学”、“丑化文化大革命”等帽子，甚至说这是“反动文学”，把它们和苏修的反社会主义文艺划等号。有时，不是由于有意颠倒，而是由于旧习惯势力的影响，由于思想认识的主观片面，也会出现混淆两类矛盾，把好人当敌对分子，把新生事物当敌对势力来打倒的错误。彻底地认识这种现象，怎样对待呢？我们的文艺家应当具有唯物辩证观的精神，敢于揭露，敢于暴露。心怀余悸，磨光棱角，不是应有的精神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当造成良好的民主风气，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尽可能减少那种混淆两类矛盾，打击作家作品的错误行为的发生，使这种行为一经发生，人们就能有效地同它进行斗争，就能有效地给予制止，进行纠正。

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正确区分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文艺工作者的绝大多数是热爱社会主义，忠于人民的。文艺领域的情况，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处理这些问题，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中的是非问题，往往和一定的政治有联系，但也不能把它们同政治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就是政治问题，也不等于敌我问题。作品有毒素，不等于作者是坏人。文艺领域的毒草，是清算思想上的毒素，而不是就等于要人，处罚作家。林彪、“四人帮”在这些问题上制造了极大混乱，他们或者把正确的东西打成谬误，进而把所谓上的“谬误”升级为“反革命”；或者抓住某个小辫子无限上纲，把一切文艺问题都打成政治问题，把一切政治问题都打成敌我问题。他们的这一套做法，在文艺界造成了一股阴森的反革命高压空气。

为了保护艺术生产力，保障艺术家正常地进行精神劳动，必须严格地实行社会主义法制。任何一个人，不管职位高低，都无权任意取消作家发言和写作的权利，都无权任意处罚作家，禁闭作品。作家有错误，当然可以批评。但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党的纪律，不搞煽动活动，那就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而究竟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要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群众性的讨论去解决，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有接受意见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的自由。因为

精神现象比较复杂，评定文艺作品，往往需要时间的考验，需要实践的反复考验。作家犯了法，当然和一切公民一样，也要治罪，但要经过法律程序，通过司法机关来处理。那种凭一篇“批判”文章，凭某个领导人的的一句话就给作家治罪的做法，完全是不合法的。那种随便什么机关都可以给人立案、审查、定案、戴帽子的做法，应当永远废止。今后，如果发现侵犯作家劳动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违法行为，应当按照党纪国法，给予纪律处分，乃至法律制裁。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实行艺术民主，就要切实保障人民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民主权利。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要懂得“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保障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监督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要实际保证人民群众的这些权利和自由得到真正实现。不是一经宪法作出规定，民主的原则就会自然而然地在文艺工作中得到实现呢？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要使宪法的原则真正在文艺工作中兑现，必须经过努力，经过斗争。必须和一切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不断在文艺界树立民主风气；必须破除种种同社会主义民主不相适应的文化制度和体制，建立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文艺生产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工作中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我们国内的一切问题在文艺工作中同样存在。文艺界存在着那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奴才主义，一些同志习惯于独断专行，习惯于靠“长官意志”办事。所有这些，都妨害了艺术民主，束缚了艺术生产力。

我们的一些同志口头上也承认人民群众的言论、创作自由，但就象周恩来同志所批评的那样，“首先是有个框子，非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按照他们的逻辑，群众虽然也可以“放”，但只有“长官意志”认为是正确的才能放。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在文艺界维持一种森严的审查制度，有时一部作品要经过群众意见，需要通过十几道关卡，需要经过数月成年的审查。他们自以为是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但实际上不是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不是干预一切、包办一切的领导。领导的任务在于掌握情况，执行政策，不是代替作家去规划每一部作品的创作与修改，代替评论家和群众去评定每一部具体作品。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努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决不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防范群众“出乱子”、“越轨潮”上头。当然，群众中也会产生某些不正确的东西，但对于这些，要正确地加以引导，而不是简单地加以压制、禁止。只有“长官意志”认为是正确的才能放，这也不足为难道表示自己的意见，完全违反党的“放”的方针吗？发表“长官”一定就那么高明，你说香花就一定就是香花，你说毒草就一定就是毒草吗？周恩来同志说得对：“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没有群众实践的检验，没有群众性的讨论，怎么能评定文艺作品的好坏呢？就算某些作品确有某种错误，为什么一定不能放出来呢？让它们在群众意见，通过群众性的讨论，克服错误，增长群众的识别能力，有什么不好的呢？当然，在我国，目前还不能废除一切对文艺作品的审查。因为，我国还存在着等级制度，存在着一些小资产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必须禁止那种反革命的，破坏社会主义自由的文艺宣传。二，在人民内部，作家有言论和创作的自由，出版和演出机构也有选择作品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选择也是一种审查。出版和演出部门必须努力选择思想和艺术上优秀的作品和群众见面。它们选不选某个作品，并不意味着剥夺作家的民主权利。因为它们没有剥夺作家向另外的部门投稿或用另外的方式公开自己作品的权利。当然，出版和演出机关在审查作品时，也要认真走群众路线，不能由某一个人独断专行。

我们的一些同志口头上也承认人民的艺术民主权利，但恰恰不尊重人民的一个很根本的权利，即参加管理和监督国家文化事业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人民的权利不过是提提意见，发表议论而已。按照他们的逻辑，“民主”是大家的事，“集中”是个别“长官”的事。群众的议论，顺耳的就听，逆耳的就不听，你发你的议论，我做我的决定，尽管群众的意见一大堆，但是最后该怎么办，还是由个别人拍板定调。离开了民主，离开了多数人的意见，还谈得上什么民主集中制呢。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不但有积极提意见，发议论，而且有权参加讨论和决定文艺事业的大政方针，有权纠正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权选举和撤换文化干部，有权监督文化机关和文化工作人员。列宁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对一切公职人员进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认为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成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显著标志。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群众通过什么方式式来参与管理国家文化机关，通过什么途径对它实行监督，采取什么方式选举或撤换称职或不称职的文艺干部，还没有形成明文的制度。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没有具体的制度做保证，那末所谓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国家的文化事业，就会流于空文。

目前，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热潮正在我国蓬勃兴起。我们深信，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周恩来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充分发扬民主，人民长期被林彪、“四人帮”所抑制的艺术创造力必将波涛万顷般奔涌而出，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新文艺。

文艺需要民主

江丰

最近，学习了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前些时候，有人劝我说：“你过去去多说话，说直话，吃了二十一年的苦头。现在年纪大了，又有病，美术界的一些事情也不好办，你的问题‘改正’以后，过个闲差使干干，落个晚年平安算了，不要再多说话话了。”对于朋友的这种关心，我应该感谢，但是很抱歉，我不能照着做。我过去为什么爱说直话？是想做一个革命者应该做的，是想说一个革命者应该说的话。尽管由于说直话使我吃了二十一年的“苦头”，但今后我仍不愿做那种“明哲保身”的政治庸人。为了革命利益，对不正之风、不义之事，我一定要说。学习了周恩来同志这个讲话，更增强了我大胆说真话、说直话的勇气。

周恩来同志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文艺界的民主精神是很差的，对文艺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周恩来同志及时提出这一问题。

依我看，文艺界缺乏民主的情况是从一九五七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当时有一种风气，就是一来就搞“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致使文艺界出现了不敢说不敢说做不敢做，学术不能讨论，创作不能发展等种种不正常现象。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正是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恶性发展。

这一历史教训是多么深刻，多么惨痛啊！

然而，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并没有为文艺界的所有同志所接受。有一些同志在拨乱反正中胆子还不

够大，思想还不够解放，对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新问题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问题，都没有认真的研究和果断的处理，这就束缚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要使文艺适应新的形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大力提倡艺术民主。

发扬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要从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做起。我多年来不曾与文艺机关、文艺团体发生关系，对文艺工作领导方面的情况不甚了解，但是文艺界缺乏民主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真心学点周恩来同志的民主作风。一应做到：在自己做报告或发指示之后，少听“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完全正确”之类的奉承话，多听不同意见和逆耳之言，做到“闻过则改”的老实态度。二应做到：不把时间和精力过多地花费在办公室里，忙于开会，听汇报，批阅文件，发指示，审查作品……，抽出时间深入基层，放下架子，同同志们谈心，了解实际情况，解决他们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种种问题，以纠正那种“长官不出门，处理天下事”的官僚主义恶习。

周恩来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这在今天更具有重要意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大大活跃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风气。但是，今天仍有人在说泄气话，不敢站在时代的前列，回答人民提出的问题，说出人民的心声。作家应该知道，在这历史大转变的时期，只有强烈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意志的作品，

才能得到观众和读者的欢迎与支持。

消除余悸，冲破禁区，是要冒风险的。那些一直把人们视为“毒草”而挨批的“内部讽刺”画和揭露社会生活中某些消极东西的文艺，一些作者和出版者至今还“谈虎色变”，不敢同它们发生关系。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中既然还存在着阴暗面，却把它排斥在文艺表现之外，那是不合理的。毛主席曾举出这样一个极平常的事说明了一个真理：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对黑暗现象，也应如此，不驱逐黑暗，光明是不会出现的。暴露黑暗，目的是为了消灭黑暗，迎接光明。两年来，全国各地报纸揭露了由林彪、“四人帮”一伙造成的大量骇人听闻的黑暗事件，深得人心，赢得了安定团结、大干“四化”的政治局面的到来。报纸敢做的，为什么文艺界却讳莫如深？其实，这种题材的文章，同其它题材的文艺一样，只要作者立场、方法对头，是决不会成为毒草的。

为了发展文艺创作，要求文艺活动的组织形式，作相应的改变。这已成为文艺工作者相当普遍呼声了。在美术方面，也有人希望组织各种画展，举办画展自负的展览会。画会的组织形式，可以推动美术家解放思想，繁荣创作，可以促进美术作品风格、体裁、题材多样化，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相竞赛、互相提高的作用。

文艺没有真正的民主，就如同花木缺乏阳光而趋于枯萎。二十多年来文艺战线上的经验教训证明，周恩来同志的号召完全正确：文艺需要民主！

